

蒋介石的三次下野与三次上台

崔本廷 张厚杭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近年来,随着对“一国两制”及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探讨,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改善,研究他的文章、专著陆续出版,研究水平也逐步提高。但对其三次下野与三次上台问题的研究尚不系统,本文将通过收集,归纳述评,帮助读者了解这一史实,并就教于史界同仁。

一、第一次下野与上台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到“七·一五”政变后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介石新军阀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他们都以合法政府自居,各自为政,互相争雄。国民党这时也存在三个中央:即武汉汪精卫集团的中央,南京蒋介石集团的中央,上海西山会议派的中央。他们虽一致反共反人民,但为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在以上背景面前,蒋介石受到内外夹攻,处境孤立,被迫下野。

第一,与汉方的冲突日趋严重。针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之党籍,免去其兼各职,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军委委员48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革命军人“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贼”^①。7月初,武汉政府组成东征军,8月9日总司令唐生智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以军驭党,以党窃政,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等罪行”^②。11日,又任命程潜,何健为东征军左右两路军总指挥,沿江东进,对蒋及其反动政府形成巨大威胁。

第二,在宁方,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主要领袖的桂系在北伐中战绩昭著,在蒋发动政变及建立南京政权过程中又屡立“战功”。之后蒋为消灭异己,曾密令何应钦寻机削弱或消灭桂系,由于无成动把握而没有执行。但当李、白知此阴谋后以雄厚实力做靠山,加紧联络各反蒋势力准备赶蒋下台。

第三,徐州败退,津浦前线失利。蒋介石为夺回徐州,以振声威,缓和各方面的压力,决定陈兵津浦路,抗击南犯的北洋军阀军队。7月25日蒋亲自北上,8月初与北洋军阀激战于淮河、徐蚌之间,由于北洋军队突由右翼向蒋军左翼包抄袭击,使蒋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成混乱”^③。8月6日,蒋仓皇退回南京。蒋谋求军事上的胜利来缓和内外夹攻的计划成为泡影;同时又把战败的责任归为前线将士对己不忠,将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杀害于杭州。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使李宗仁等将领受到极大震动,对蒋更加失望,寻机发难。

第四，当时，宁汉双方都想拉拢有雄厚军事实力，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冯玉祥，以便搞垮或消灭对方，但冯“只承认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而否认蒋介石自立的南京政府。”④在7月下旬，蒋屡电冯玉祥出兵山东德州以牵制北洋军阀的攻势，而冯置之不理。8月3日徐州失陷，孙传芳乘胜南进，同时武汉东征军又节节进逼，将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再一次请其出兵津浦路或攻打武汉，又被拒绝。这样蒋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有力支持，使其陷入孤立。

在上述政治、军事危机，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蒋介石为缓和空气，避开锋芒，局外观战，于1927年8月13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宣布下野。

蒋既然宣布下野，为什么几个月后又重新上台呢？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蒋介石下野后，指挥人马到处活动，为重新上台创造条件。蒋下野后，蒋系起鼓噪，四处鸣冤，以张人杰、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和国民党要人声言与蒋“同进退、共沉浮”，为其复职周旋。宋子文等在各帝国主义间、国内各派系间拉关系、找靠山。同时蒋于9月28日亲渡日本访问。这次东渡有两个目的：一日换取日本政府的支持。11月5日蒋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进行会谈，由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之援助。”⑤二是拜见宋母，求得与宋美龄结婚。这桩婚姻，对蒋以后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后来一家报纸在报道蒋、宋结婚的消息时题目为《中美合作》，意为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结合，又是中国与美国的联姻。蒋达到预想之目的，于1927年11月10日回到上海，加快了复职的步伐。

第二，由桂系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特委会”控制不了南京政局。蒋下野后，其亲信仍控制国民党的重要机关。陈果夫把持中央党部；上海买办，银行家拒绝向南京政府交税和贷款；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买办、各商业团体抗议，反对由桂系任命的上海市长；国民党的一些军队，特别是何应钦的第一军继续听从蒋的调遣。这样桂系无法行使职权。

第三，以汪精卫等为首的汉方，粤方与桂系为首的宁方分庭抗礼。蒋下野后，汪精卫没有实现自己坐第一把交椅的宏愿于9月21日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29日发表通电不承认南京“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10月19日，汉方的何健军与桂方的程潜军激战，爆发了宁汉战争。之后桂方三路西征，打败唐生智，占领武汉。汪精卫不甘心失败，又于10月29日跑到广州，投靠李济深。11月1日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产生“合法政府”，解决国内一切争端。这样宁汉对立刚以武力解决，宁粤对立又立刻出现。

北洋军阀利用国民党纷争之时发起反攻。孙传芳搜集残部，向南京隔江炮击。奉系张作霖西攻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面临巨大压力开始向蒋求援。原来众叛亲离的蒋介石，顿时身价倍增。

第四，蒋直接策划，挫败对手重新上台。蒋介石回上海的当天，为打败桂系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共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一问题。第二天，汪精卫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这时桂系怕蒋、汪联合对己不利，马上向蒋靠拢，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共同解决国内争端。12月3日，预备会开幕。会上，桂系和李济深以广州事变为借口排挤汪派，而汪精卫为摆脱孤立地位于10日抢先提出唯有蒋

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⑥。桂系无耐只得赞同。这样，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蒋介石复职的决议。1928年1月9日蒋在南京发表通电，宣告复职，并表示将“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⑦

二、第二次下野与上台

蒋介石上台后，虽迅速取得北伐和新军阀混战的“胜利”，但由于其继续坚持独裁统治，使国民党内部分歧日益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蒋的反动统治危机四伏，使他不得不第二次宣布下野。

第一，国民党内部分强大的反蒋势力不断发展。1931年2月28日夜，蒋把反对和抵制其当总统的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界纷纷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反蒋各派也乘机举起反独裁、要民主的大旗。5月27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并任命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与南京蒋的国民政府相对峙，从而形成斗争激烈的宁粤对立。28日非常会议发表《国民政府宣言》，声言蒋“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下野。”此时蒋采取以拉为攻的策略，先后派吴稚晖、张继等南下与反蒋各派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宁、粤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11月12日蒋首先在南京召开四大，强调“党内的团结，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整齐步骤，听命于党，进则同进，退则同退”^⑧。对其下野的言论和主张进行反驳。在11月18日至12月5日于广州召开的第二个国民党四大上孙科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蒋中正必须下野，并解除兵柄，否则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仍在粤行使职权。”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和汪精卫又联合声明，“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派、汪派中央委员即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面对如此处境，不下野决无二法了。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的不抵抗政策，使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空前高涨，动摇了蒋的统治地位。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向我国东北大举进攻。而蒋为“剿共”及对付粤方反蒋势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屈辱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使整个东北被日军占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挽救民族的危亡。1932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宣战通电》，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东北，广大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击日军侵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等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杨杏佛、史量才等也批评蒋的不抵抗政策，要求一致对外，收复失地。1931年10月东北军马占山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日，12月14日被蒋派往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17000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在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逼迫下，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于1931年12月15日批准了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总司令职务，蒋第二次下野。随后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举行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不想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下野只是玩弄的缓兵计，而在下野前就为重新上台作好了准备。

第一，安插亲信，剪除异己。蒋在即将下野的前夕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这一人事任命使蒋得以控制江浙和首都南京，保证了下野后仍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实力。

第二，蒋的策划使孙科新政府财政窘迫，外交危机。蒋下野后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重要职员被遣散，重要档案被带走，使财政部无法运转。同时财政入不敷出，政府月收入只有600万元，而每月军费需1800万元，行政费每月400万元，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巨，上海金融界又拒不贷款。财政困难使孙科团团打转，一筹莫展。孙科认识到，蒋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抵抗政策”受到各界的反对，因而为取得人民支持，主张“对日绝交、积极抵抗”，但“无绝交的办法、抵抗的措施，实际行动仍然是交涉、不抵抗”。^⑩结果不仅没有收复失地，而且日寇加紧进攻上海，日舰在宁、沪长江水面来往穿梭、挑衅示威。

在孙科无力掌握局面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被迫于1932年1月2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邀请蒋重返南京，共商大计。孙科只好向蒋发出邀请电：“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精卫）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⑪28日，蒋在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成立军事委员会。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44天后又重新上台并当上权势更大的“军委会委员长。”

三、第三次下野与上台

蒋介石当上“委员长”的17年后，于1949年1月21日在南京总统官邸召开的国民党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上宣布：“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李宗仁）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蒋在历史下第三次下野了。为何“非引退不可”呢？下野宣言中的一句话基本概括了其中的原由：“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已达到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战绩辉煌，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面对美蒋反动派挑起的反革命内战，为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6年7月到1948年8月两年的作战中歼敌达26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特别是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即从48年9月到49年9月的战略决战又歼敌达154万余人，占国民党第一线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蒋赖以统治的支柱即将倾覆。

第二，国民党的政治、经济面临崩溃，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伪国大、伪宪法，使蒋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同时，蒋为支付巨额军政费用无止境地印制钞票，使全国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国民党在经济上已面临崩溃。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6年12月底爆发了反对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又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反对蒋

的独裁统治。同时沈钧儒等重建民主同盟领导机关，宣布“必须粉碎一个独裁的、反动的、腐化的政权。”5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立即得到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欢迎，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至此，蒋已成为孤家寡人。

第三、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逼蒋下野的攻势。蒋面临的危机，使美国认识到他已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于是开始放弃对他的支持。1948年10月23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建议美国国务院“我们可以劝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⑩11月9日蒋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支持，给旱被婉言拒绝；28日派宋美龄赴美求援又遭拒绝。而桂系在美国支持下采取了同蒋决裂之态度，逼蒋下台。在淮海战役吃紧、杜聿明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待歼之际，蒋急调宋希濂来徐州增援，但遭到白崇禧的阻拦。程潜、张轸、李宗仁明确提出要蒋“下野”，以挽危局。于是不得不于1949年1月1日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在继续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条件下愿意与共产党恢复和平，并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暗示已有退意。

第四，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在蒋家王朝面临覆灭而又玩弄“和平”阴谋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代表共产党中央发表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并引用了古代希腊农夫救蛇的寓言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真正的民主派牢记农夫的教训，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将革命进行到底。14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毛泽东的声明，给蒋的“和平”阴谋以致命的打击，使他认识到和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在如此困境下被迫于1月21日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

与此同时，蒋为实现挽救残局、重振旗鼓的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稳住桂系，使其坚守长江防线并进行试验和谈。为经营台湾，1948年12月24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18日又任命他为台湾警备司令，3月又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揽了台湾党政军一切权力。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后，蒋又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据统计，运到台湾的黄金有11万多两，白银3亿多两，银元800万元。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6月，蒋在台北建立“总裁办公室”，7月16日正式成立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为主席。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0“代总统”李宗仁离开桂林到美国。12月1日重庆宣告解放。7日，蒋决定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0日最后离开大陆逃奔台湾。1950年3月1日，蒋在台北再次上台，复行“总统”职权，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13日蒋发表讲话“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功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⑪他不会也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使命了，于1975年4月5日客逝台湾。

四、几点归纳

纵观蒋介石三次下野与三次上台这一重大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下几点：

首先，蒋的三次下野是被迫的，也是“以退为攻”的策略。他把在位时形成的各种无力解决的危机和困难交给“继承人”，接着又利用这些危机和困难，利用“继承人”在位时新形成的矛盾和困境，在各派间挑拨离间，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即实行“以拉为攻”的策略来增强实力，抬高身价，使之成为新的“救世主”而重新上台。第一次下野后，拉拢汪精卫、李济深等把桂系推下台；第二次下野后，联合汪精卫，指挥宋子文、何应钦等把孙科逼下台；第三次下野后，把桂系推向内战与和谈的前沿，而自己集中精力保存实力，准备退居台湾第三次上台。这些充分表现了蒋善用权术，阴险狡诈的品质。

其次，三次下野与上台都与帝国主义有关。蒋有帝国主义作靠山，才敢于坚持独裁，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但它的独裁和内战又使统治危机四伏而被迫下野，又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得以重新上台。在北伐进入高潮时蒋以“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换取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支持，才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为上台又获得日本的“充分援助”。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蒋又失去日本的支持并在30年代后接连制造侵华事件，加速了蒋的第二次下野。但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继续支持蒋，以至在抗战胜利后帮助蒋进行长达四年的内战，其间虽曾失去美国的信任而让位李宗仁，最后并没有分道扬镳，退到台湾后获得大量美援才得以苟居一偶之地。

再次，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蒋虽然在第一次大革命前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些联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但观其一生，反共反人民具有一惯性。第一次下野前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下野后又和国民党各派、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一致反共”；第二次下野前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反动“围剿”上台后又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围剿”，使红军被迫长征；第三次下野前又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反共内战，到台湾后仍坚持“消灭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与人民顽抗到底。

历史已证明，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统治，无论施展多少政治权术，有多大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最终只能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注释：

①⑤⑦⑧⑩⑫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版，第108、121、125、186、191、501页。

②肖效钦：《中国国民党史》安徽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③《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5页。

④1990年6月16日《团结报》。

⑤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⑥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第232页。